

□ 付 伟

## 论中国西部地区的优区位—产业协调发展<sup>\*</sup>

西方古典区位理论着重研究的是如何为工农业部门的发展确定优区位,它是为部门布局优化拓荒的,一般来说最优区位都在发达地区,并拥有先进的产业部门。显然,古典区位论涉及面是狭窄的,但它却道出先进产业的重要性。由古典区位论——成本决定论发展到利润决定论的区位论,表明人们在判别区位因素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它已从单一成本扩展到考虑供求因素,而供求本身又包含着复杂的因素,成本最低只构成了区位因素的一部分。而现代区位论(可称之为行为区位论)不单一是以成本最低和利润最大确定优区位,往往取决于区位决策者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无论如何,它们都要以先进产业为基础。

区位论是生产布局的基础之一,但由于区位论往往着眼于企业利益,具微观性,因此,它与区域经济要研究的区域最优产业,有时是一致的,有时是矛盾的。

区域经济本身包括区位,如果我们把区位论进行放大,放大到区域或国家,那么,就有区域最优区位和国家最优区位,其产业的发展仍然是核心,不过就是要从区域或国家的角度来考虑产业优化和发展问题。

区域产业优化和发展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必须考虑到与区域发展的协调,这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基本问题。例如解放初期,全国70%以上现代工业偏集在从辽宁到广东狭长的沿海地带,内地和边远地区的现代工业基本上是空白。为了改变旧中国区域性不平衡和结构性不平衡的矛盾,中央以直接行政手段集中进行了投资驱动,西部民族地区大规模移入了现代工业。现代工业的移入,对西部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繁荣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应该说,西部民族地区大工业的移入可谓区域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所移入的大工业在相当程度上与西部民族地区自身的社会需求与客观条件相脱离,从而形成了西部民族地区的二元结构。从结果看,并没有使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也没有同区域经济形成协调发展的局面。具体表现为大工业与地方工业的分离、大工业与农牧业的分离及现代城市与落后农村的分离。

区位的概念是多层次的,是发展的。

实际上,在落后国家和地区,在其工业化水平较低,并拥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的条件下,随着产业结构向合理化的发展进程的推进,“区位”的概念是存在的,其实质是各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不同组合特征的集中表现,比如资源开发区位、农业区位、贸易区位、高科技区位等。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区位的概念逐渐扩大并综合化,使得现代经济由区位向非区位经济转化。

从区域角度考察区位的话,区位是产业结构的区域基础。区域资源、环境特征、产业状况和市场环境组合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区位,即优区位。优区位代表着具有明显优势产业的区域。

不仅如此,优区位的形成、转化及演变还依赖于生产要素及其联系形式的变化而发生的,

• 西部民族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宁夏、新疆、青海。

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决定了优区域的演化机制,在这种机制作用下将形成区域经济产业化,而区域经济产业化过程又与区域城市化发展相一致,产业的发展又以城市为依托,城市以产业为基础,在一个区域内形成以产业环链为中心的城市体系,促使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从而达到区域发展的现代化。

政府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各种政策手段来引导、调节优区位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推动或限制区域经济的发展规模、方向、水平,以达到与国民经济总体发展协调的目的。

如上我们可称之为优区位—产业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理论,以此为指导的区域发展战略可称之为优区位产业协调发展战略。

由于区位的实质是各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不同组合特征的集中表现,它决定了优区位—产业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理论的实质就是以资源转换为特征来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

从构成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来看,组织现代化生产,形成现实的生产力,一般要人才、技术、资金和资源在同一空间上有机组合,缺一不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所构成的一样,在以上四种资源中,人才代表现代生产力的中坚,技术和资金主要代表着现代的劳动手段,自然资源构成最基本的劳动对象。各种资源依据综合比较优势被组合在一定的区域内并形成现实生产力即产业,这就是优区位中的产业结构。

考察现代化社会的大生产,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组织生产的起点,往往很少同时充分具备以上四种资源。较为普遍的是,拥有其中一种或某几种资源,利用自己拥有的资源优势,吸引其它资源进行生产的空间组合,从而形成现实的生产力。这种以一种或某几种资源吸引其它资源在一定区域或在国家内进行组合形成现实生产力即形成产业的发展,称为资源转换。

现代资源转换有三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拥有人才或拥有人才和技术的优势,吸引资金和自然资源的组合,形成现实生产力,可称之为智力资源转换型。日本近代的经济的发展就属于该类型。第二种是利用拥有的自然资源优势,吸引技术和资金、人才资源,形成现实生产力,可称之为自然资源转换型。象中东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就属此类型。第三种是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所在同一生产过程中相互渗透、密切结合,可称之为资源综合转换型。象前苏联、美国即属此类型。<sup>①</sup>

资源转换中生产力要素的有机的结合,必须借助于某种机制(比如计划机制或市场机制)推进形成,从而使其组合成现实生产力。不仅如此,资源转换还必须以某一区域中优势资源协调和配套,以及和已有的产业基础结合成新的产业,方能实现有效的资源转换。资源转换不仅要注重静态的比较优势,还要注重动态的比较优势,否则会形成僵化的区域分工格局,有碍于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

由此可见,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具有丰富的内含,是否能形成有机的组合,将决定“它们的质和量,它们的组合或综合,形成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这个特定的生产力又在它的作用的结果的产品上表现出自己的效率。这个效率就是经济效益的根本所在。”<sup>②</sup>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就其转换模式来讲,由于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显然是适用于自然资源的转换类型。但是,建国若干年来,在封闭的、以静态比较优势为主的资源转换中,西部民族地区在区域分工格局中始终处于劣势,这种初级自然资源转换是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以垂直定向划拨流向并以使用价值生产、以宏观纵向的政策操作为前提而形成的。

应该看到,这种操作由政府来塑造人为平等的环境,从而代替市场竞争机制确定“优”和

“劣”，从短期来讲，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其实质对“优”、“劣”双方都会有不利于长远发展的因素。极为典型的表现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所形成的输入（国家投资和补贴）—漏出（双重利润转移，即西部民族地区能源、原材料生产在价格偏低及调入制成品价格偏高情况下所形成的利润转移）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的存在不仅使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相对落后的地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积累着落后和贫困，更为严重的是造成西部民族地区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被动、呆滞、僵化，造成人的主动性、进取性的退化和丧失，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巨大障碍。值得指出的是，80年代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这种政策操作的体制保障和微观基础已逐渐被打破。就西部民族地区而言，优区位—产业协调发展战略是其实现工业化的根本途径。然而，以市场取向为主的自然资源转换必须是开放的，以动态比较利益为主的，注重逐步向资源综合转换型发展。

第一，自然资源转换应在优区位中进行。

优区位是具有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的区域，在企业和地区作为主体的区域分工格局中，只有在区域内进行自然资源转换，才能按照全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国内外市场的变化情况，发展和引进技术和人才，开发具有市场优势的自然资源。

以往的西部民族地区的开发大都没有注重发挥市场优势，走了一条资源—技术—市场的路子，仅以自然资源为本进行开发，结果，不仅造成经济效益低下，而且也不利于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甚至造成亏损。因而，由资源—技术—市场转向市场—技术—资源则是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二，以动态比较利益为主的自然资源转换，其目的是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

在以动态比较利益为主的自然资源转换中，必须打破过去的以静态比较利益的区域分工及西部民族地区以低附加价值产业为主的倾向，不能只追求几项产品的单一开发，而要通盘考虑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带动下，实现科技、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发展，实现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同步建设。在此基础上对已开发的自然资源进行适度的深加工和综合利用，通过不断提高附加值从而强化转化层次，向资源综合转换的高层次迈进。

第三，以动态比较利益为主的自然资源转换，必然要求其自然资源转换的开放性。

它不仅要对国内开放，而且也要对国外开放；不仅要对国有企业开放，也要对其它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开放。这种开放的基础是广泛地进行商品交换和市场开放，形成以城市网络构成的市场体系。

开放式自然资源转换作为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期发展方略，必须兼顾全面资源开发与资源优区位重点开发的协调。由于西部民族地区肩负着为整个国民经济供应能源、原材料的重任，特别是在全国统一市场尚未形成之前，要注意资源开发中的资源优势导向和市场优势导向的协调。资源优势导向侧重于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市场优势导向侧重于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影响。

（本文是复旦大学199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西部民族地区投资问题研究》的一部分，导师为王克忠教授）

注：①参见潘照东：《开发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②见张薰华：《生产力与经济规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